

我国中产阶层规模有多大

时事点评

□吴学安

中等收入者,通常被称为中产阶层,是指处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群体。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属于中产阶层,因为缺乏社会公认的标准,谁也说不清。一般而言,中等收入者是

消费主体,但这些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有效扩大。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突出的位置,正切中了当下社会治理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点。有学术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 2.4 亿人,约占 23%;若以每人每天消费 10~100 美元为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有 1.5 亿~1.6 亿人,约占 12%。此前财政部则称,个税起征点上调到 3500 元之后,纳税人数由约 8400 万人减至约 2400 万人。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

市,有相当一批中等收入者在老人赡养、子女教育、高房贷等压力下,沦为“伪中产”。

此前,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一个研究报告称,到 2020 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到达 7 亿,年收入可达 8 万元,为此很多人发出这样的惊呼:“我们被中产了。”很多国人之所以感觉到自己“被中产”,原因有很多。比如,在房价泡沫四溢的今天,一个连一套房子都没有、居无定所的人肯定是难以称得上中产的。而有些有幸被划入中产的人尽管有自己名下的房产,却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像这样属于“负资产”的人也不是名副其实的

层。

对于中产的定义,尽管中外国情有别,但也不应和公认的中产概念差别太大。如果随便都能背上“中产”的名声,不但难以让人相信,还会带来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如果通过有失科学合理的划分方法人为夸大中产阶层的数量,就会不利于国家与政府更为积极地出台各项帮扶中产阶层发展的政策与举措,也不利于政府通过更为有力的调控措施防范通货膨胀,最终不利于中产阶层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

呈现出橄榄形结构,即富人、穷人都是少数,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务实,充满理性,从而有利于建设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因此,国家通过政策措施扶持中产阶层发展,不断扩大中产阶层数量,使社会呈现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结构,实为当务之急。因此,我们要勇于面对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富裕的国情,坚持不懈地抓好扶贫济困,通过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来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

可怕的育儿宠物化

□吴 知

1 岁 4 个月大的孩子到妇幼保健所亲子园做发育测评时,儿保医生发现,东西递到手边时,她居然不会用两只手去拿。在 110 名孩子中,近八成存在与此类似的情况。孩子的外婆说,在家里一般很少让孩子去拿东西。孩子想要什么,一个眼神、动动下巴或者“嗯”一声,大人就帮忙送到跟前。(据《长江日报》)

现在一家一个宝儿,无不随时随地处在“保护”状态之下,但是“保护”过头,就成了伤害。物极必反,不仅是哲学定律,更为现实所屡次证实。小老虎由人工喂养长大,固然不会饿肚,但同时就失去了捕食本领,有的动物园就发生过小牛把老虎吓得到处跑的“奇闻”。在自然界根本不会出现的现象,在社会中真实地发生了。

人的成长本来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但现在的很多家长,非得想方设法把它弄成一个“真空化”的过程——不让一点“杂质”掺和进来、不让一点“负面”的东西来影响孩子。其结果,就如上面的 1 岁多的孩子不会拿东西一样,孩子的社会性退化到极度萎缩的地步。这样的培养模式不是在害他们吗?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学历社会中,所以相当多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就是“你给我把书念好了,其他的都不用管”。这样的孩子或许会拿到硕士、博士的“文化学历”,但他们的“社会学历”之低,可能连小学都没毕业。依赖性很大,独立性很小;生存能力脆弱,应变能力低下;不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连基本的待人接物也不懂;无事时目空一切、过度自大,有事时却惊慌失措、极度自卑……一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往往就集合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下一代多了,不是很可怕的事吗?

“民心金牌”最可贵

□岸 雨

12 月 20 日,27 个城市(区)受到表彰,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新科状元”。厦门等 23 个城市(区)也继续保留了“文明”荣誉称号。

无论是“十年长跑”文明创建的长沙,还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贵阳;无论是历史文化悠久的洛阳,还是勇夺文明城市“三连冠”的宁波,在创建文明城区的过程中,对“文明”的理解更加透彻,路子走得更加均衡,民众基础更加厚实。在拉萨,新建村道 4352 公里,226 个行政村实现了饮水安全,21.98 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沼气;在广州,“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美”,迎来的亚运时期新广州的再跨越,开启了市民对城市自豪感归属感的新追求。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设城市为人民。城市的真实表情,体现在群众的喜怒哀乐;城市的金杯银杯,取决于百姓的口碑。以民心工程提升文明指数,让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中受益,既获得“文明城市”的至高荣誉,更摘得“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民心金牌”,这是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根本目的,也是城市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

“枪手”之祸



2011 年的日历只剩下最后几页,临近年关,忙碌了一年的上班族依旧不能轻松。述职报告、年终总结、新年工作设想、年会节目策划……这些都让不少白领头疼不已。

记者近日在网上发现,庞大的年终总结需求使各类“网上代写”订制服务悄然走红,生意异常火爆。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在网络复制和微博的年代,写几千字的文章已经成为一件难事,网上继而也出现“千字 70 元”的年终总结枪手。卖家不仅可以根据购买者的职业量身写作,还保证绝对原创,免费修改。伴随火爆的代写业务,隐私泄露、诚信危机等忧虑也随之而生。新华社发

画中有话

足坛反腐“小数字”扯出一个大江湖

□曹亮

273 万,125 万,94 万,81 万,还有三万五万的……这些数字跟其他领域内动辄数千上万甚至上亿元的涉案金额比起来,只能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了。但就是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小数字,却带出了一个潜规则肆虐的大江湖。

有圈内人士在评价本次足坛反贪腐行动时直言:抓到谁算谁倒霉。言下之意,不干净的人其实很多。而事实上,这起震惊世界足坛的“8·25”大案,起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前辽宁广原俱乐部总经理兼领队王鑫。

如果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王鑫带队在新加坡联赛中打假球,被新加坡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的话,是不可能一次性“网”出这么多条大鱼的。

不过,能被王鑫这条线带出来的毕竟不可能是足坛全部“罪人”,正如一位被告球员家属所言:“我所知道的一位参与赌球的现役国脚就没事儿。”而像这位国脚一样尚未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圈内人应该还有很多。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这句话以前是圈内人给自己找借口用的,如今却成了对事实最好的印证。仅“8·25”一案就牵扯出多名足协官员、裁判员,多名俱乐部老板、教练员,还有多达十多家俱乐部进了行贿名单。这也就难怪像孙葆洁这样洁身自好的裁判,会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这恰恰是中国足球圈在经历

本轮反贪腐风暴后,依然无法让人放心之处。一位体育法研究方面的专家曾说过,法律是底线,体育圈子因其特殊性,所以,自治和自律更为重要。

只是靠潜规则存活多年的这个足球大江湖,真能在几个“一夜白头”的教训面前彻底改邪归正走上正道?如果真能如此,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惯犯,也不需要警察了。张建强在法庭陈述时说:“那是一个没人监管没人约束的年代。”这句话跳出江湖来理解,就是司法并不会轻易介入足球圈;放在江湖内来看,则凸显出管办不分离、官商不分的弊端。

问题是,此番司法介入源于王鑫这个“偶然”,仍有大批潜规则的俘虏逍遥法外,而江湖内的体制改革却仍停留在嘴皮子上。没有真正的管办分离及官商分开,或者只是面分实不分,那江

湖的自治和自律又该从何而来?!

热热闹闹的“铁岭审判周”暂告一段落,谢亚龙、南勇两名足管中心前高官不久后也将坐上被告席。这是司法介入体育圈的一个成功案例,但说这是中国足球的胜利还为时尚早,指望中国足球乃至中国职业体育就此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迹,更显一厢情愿。

8 年前判了一个“黑哨”龚建平,却未给中国足球带来明媚阳光,8 年后的“铁岭审判”,仍然不会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个江湖的自律,源于这个江湖的良好自治力。没有这些,8 年又 8 年,江湖只会重复同样的故事。

近段低调至静音状态的中国足协,一直在等待法院的结果。把一切诉诸法律似乎成了逃避和拖延的最好借口。但在检察机关做着他们该做的事时,中国足协是不是也该补上自己欠下的功课。